

伦特奈尔·乔巴 (*Lentner Csaba*)

新冠病毒(COVID-19)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和政 府的危机管理手段



概述

本文分析新冠病毒对匈牙利经济和公共财政的影响。经确认，匈牙利被疫情波及时，虽然其经济维持了稳定，但却带来了明显的经济衰退和财政状况的恶化。这场危机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其影响是长期的，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就经济复兴而言，著者解释说应该更加重视改善全球经济趋势的变化和匈牙利经济内部结构中的瓶颈，即竞争力较弱的领域。换言之，经济恢复计划需要沿着一条全新的财政和货币道路，更加重视国家经济竞争力发展，同时避免陷入另一个债务陷阱。与处理之前的，2007-2008年的危机相比，财政政策应在这场危机的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本文重点讨论财政危机管理工具。本文涵盖一个相对封闭的时间段，因为从2022年2月开始，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全世界都受到俄乌战争的负面经济影响。

经济文献杂志 (JEL) 代码: B52, E42, G01, G28, H31, H63, P41, P43

关键词: 流行病危机、财政政策、金融机制、竞争力

伦特奈尔·乔巴博士教授 (Prof. Dr. Lentner Csaba) 讲座教授，匈牙利行政大学塞尔·卡尔曼 (Széll Kálmán) 国家金融研究工作坊主任，卡罗利·加什帕尔加尔教会大学 (Károli Gáspár Református Egyetem) 政治学和法学院系主任 (Lentner.Csaba@uni-nke.hu)。

匈牙利在危机前的主要监管和经济基础

在2010年议会选举后，匈牙利告别了之前的原始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财政工具以及2013年开始的货币监管都被置于新基础和新立意上。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从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加速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带来了单纯的转型危机（Kornai, 2006），而且还面临了政治制度转变的系统性危机（Lentner, 2016）。尽管计划经济被注入了市场元素，但仍然具有固定的经济管制、计划经济体制的首要地位和国家所有制的主导特征。这些因素，特别是整体激励和物质利益关系不足原因，整个系统逐渐疲于奔命并且崩溃。计划经济的原始市场要素（如与工业和服务产业相关的经济合伙企业，或农业相关的庭院农业公司），也就是基于内生因素的市场举措，在政权更迭的经济政策中没有得到优先考虑，所以它们的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遏制。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财产改革、放松管制的过程开始，减少了国家的家长作风。这些都是沿着由外部利益和资源驱动的新市场模式发生的，然而，这个过程太快了，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过渡。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十年，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低于预期，国内中小企业的资本、流动资金和产力短缺和不足，而外国流动资金的流入对整个公共财政只产生了有限的积极上升影响。在匈牙利政治制度转变过程的前20年中，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成为了系统特定要素。随着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的积累，公共债务成倍增加，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轨迹一直充满了危机（见1995年、2006年和2008年的危机）。

用什敦普夫·伊什特万（Stumpf, 2014）的话说，“政权更迭具有天生的缺陷”。什敦普夫所述的缺陷包括，传统的工会无法摆脱与党国体制合作造成的隔离状态，专业合作还处于萌芽的状态，行政系统处于强烈的地位束缚之中，政治精英群体的特点是在思想上的分歧。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没有支持政权更迭的进程。什敦普夫认为，在政权更迭期间，出现了许多合法、结构、政治和文化性缺陷，这些缺陷大大限制了政治系统的能力，阻碍了问题和冲突的合理解决。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并没有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而专注于解决制度所产生的冲突，有时甚至是重燃这些冲突。

社会政治方面的负面因素阻止了国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层面向预期质量的有效转型，甚至由于缺乏共识而导致经济转型的失败，使事情更糟的是财政管理方面的低效和经常无序的（可以说是没有纪律的）做法。

始于2010年的公共财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巩固财政收支状况。《匈牙利基本法》（2011年）规定，议会不得通过可能导致外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半的中央预算案。《基本法》第5条还规定，当国债多于国内生产总值一半时，议会只允许通过旨在降低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中央预算案。只有在处于“特殊法律秩序”的时候，在缓解特殊情况造成的后果所需要的程度上，或国民经济持久和大幅下滑的时候，在回复平衡所需的程度上可以偏离上述一般规定。这种偏离措施从2020年开始就被实施。

立法者用所谓的根本大法来补充促进公共财政稳定的规则。其中(出于主题领域的重要性)我提及促进和保证预算纪律的《国家审计署法》(2011年)、《稳定法》(2011年)和《匈牙利中央银行法》(2013年)。为了控制公共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监督国家资产的管理、保护和利用以及执行《基本法》,议会根据《基本法》第43条第(4)款,确立了审计署的权利范围,并赋予议会的最高审计机构比以前更强大的权限(Domokos 2016/a)。匈牙利国家审计署在行使其权利时,为稳定匈牙利的公共财政、促进守法行为和有效的公共财政管理做出了重大贡献(Domokos, 2019)。需要特别指明的是,除了对中央预算和地方政府子系统的审计之外,审计署还对公共事业单位进行目标审计,因此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Domokos, 2016/b)。

《稳定法》是财政管理方面最重要框架法律之一。其第二章第2条至第7条详细规定降低国债的规则。在起草2016年预算时,首次采用了国家经济稳定法中规定的减债规则。在此之前,在起草预算法时则采用了2011年春季趋同计划中规定的赤字数字。该法律第二章第3点的内容限制公共债务的产生和增长的规则。地方政府借贷条件也被收紧:未经中央政府同意,地方政府只能借欧盟发展项目所需要的贷款,以及在债务清算程序中用于订立债权协议的重组贷款和流动贷款。根本大法中对预算理事会(以下称KT)的组织和程序规则也进行规范。在预算案提交给议会之前,预算理事会会对政府提出意见。如果预算理事会认为,该草案是没有根据的,政府将对其进行重新评论,然后将其提交给议会。预算理事会又讨论已准备好的预算草案,而且如果不符合关于减少国债的宪法规则,可以禁止议会通过该预算案(Kovács, 2016)。

《稳定法》第五章规定公平课税的基本规则。从原来的36%先降低至16%,随后降至15%的个人所得税率从2013年1月1日起统一,而企业税率(9%)从2015年初开始强制统一的。每个孩子的家庭税收优惠根据孩子的数量而有所不同,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的情况下可获得较高的家庭税收优惠。家庭优惠不得低于前一年的比率。有关其生效前的时期,法规不得增加纳税义务、扩大纳税义务人的范围和取消或限制优惠或豁免。

匈牙利国家银行相关的法律从2013年起扩大了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只有央行发挥的调节通货膨胀的职能,从而能采取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平衡的措施(Matolcsy, 2020/a)。然而,新型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妨碍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已经证实,2007-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匈牙利政权更迭后二十年不够审慎的财政政策造成的创伤,以及复苏本身除了采用通货膨胀政策之外,还需要对平衡和增长因素的高度支持。新匈牙利中央银行观念和实践工具箱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世界趋势,甚至有效反映了匈牙利企业和社会的需求(Lentner, 2015)。

财政政策、监管、审计和央行措施稳定了匈牙利的公共财政系统。2013年,结束了欧盟对匈牙利的过度赤字程序,而且国家进入了增长期。2010年和2019年之间,匈牙利经历了过去一百年中最成功的十年(Virág, 2020)。尽管在2020年春天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匈牙利经济处于强盛状态,但却在之后遭遇经济下滑和金融平衡恶化。

流行病危机的本质

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危机和13-14年前的（过度信贷问题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不同，因为在这场危机内，各国不得不面临一个外部的，不是经济来源，但造成经济问题的现象。事实上，这是一场具有重大影响的，对供给和需求影响都产生影响的卫生危机。从经验上看，基本上不允许劳动力从事生产、不让已经接近过度流动状态的社会旅游，或在公共场所逗留和享受在公共场所提供的服务。由于传染病扩散风险需要控制，所以生产，特别是服务产业的生产下降，为了“适应”需求的降低。这场与十年前危机的性质不同，十年前的（按照1929-1933年危机的思路形成的）危机有相应的管理模式。20世纪初的危机是由生产过剩问题引起的，而2007-2008年出现的问题是由银行没有充分控制的过度贷款引起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解决流行病危机的万全之策。新冠疫情危机结果将取决于如何，何时最终控制疫情，而且只有在成功控制后，才有望持久恢复经济。而一个国家如何应对问题，主要是取决于其经济基础和和因此具备的抵抗力。总的目标是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实力、维持企业和家庭的运作，也就是说，目前在进行一种损害控制经济政策，因为在疫情顶点还不可能复苏经济（Czeczeli et al., 2020）。

考虑到新冠疫情危机的性质，政府通常在预算的收入方面进行干预，也就是减税，并且在支出方面则提供产业补贴，增加社会福利收入和资助。与中央银行一起试图减轻家庭和企业对银行的偿债义务，试图减轻借款并且采用国家担保。而在具体措施方面，例如在匈牙利，延长了生育津贴的支付时间。在危机管理期的第一年，匈牙利中央银行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还扩大了其“增长信贷计划”的范围，但后来为了遏制过多资金外流，减少了“增长信贷计划”的比重，甚至开始一轮基准利率上调。但是这场疫情的影响是复杂的，最终会导致财政政策的扩大，甚至增加赤字，以资助所出现的额外需求。即使有部门工资补贴，但匈牙利的失业率也略有上升。匈牙利以外，在斯洛伐克，8年级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的失业率上升了20%。这预示着另一代迷失的人。欧盟的失业率已从7-8%上升到18%，但南方国家的局势更糟糕，到2021年已上升到50%。匈牙利的情况要好一些。2021年4月份（在疫情高峰期），失业人数为211,000人，同比增长24,000人，比3月份多17,000人。也就是说，失业率在一年内上升了0.5%。在这种小幅上升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是，部门工资补贴的平衡作用、投资的连续性，以及政府与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不同，没有优先选择提供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社会收入和福利，而是将补贴与劳动力市场活动挂钩的财政决定。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张在危机时，需要国家的“重视”，也就是强调扩张性反周期财政政策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国家能通过财政手段（如基础设施投资）人为地维持有效需求，从而使经济更接近平衡，减少失业。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积极干预对所有人都有利。即使以无担保的现金流出导致预算赤字作为代价也是有益的：在经济复苏时期，这应通过抑制公共支出来抵消。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不像财政干预那么可靠控制需求的

工具,因为投资的增加可以通过稳定的投资乘数来准确确定。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对当代的意义在于,与2007-2008年的危机管理不同,各国中央银行现在危机管理中能发挥更小的作用。世界主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英国央行、欧洲央行),特别是匈牙利中央银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在管理以前的危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在上个十年末期(部分是货币供应量持久性增加的原因)通货膨胀的威胁出现了。因此,在当前的十年里(也许与危机无关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正呈现出一个新的层面。因此,大部分的危机管理将不得不通过财政手段来解决,这也给匈牙利财政部将带来新的和比以前更严峻的挑战。中央银行和政府被迫使用比以往更先进的工具(Borio-Disyatat, 2021)。这在匈牙利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匈牙利财政危机管理的主要战略方向和成果

匈牙利的危机管理主要集中在挽救就业和实行暂停偿债。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帮助了近5万家中小型企业。政府提供工资补贴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企业,到2021年夏季开始为止,使用约800亿福林来保护25万个工作岗位。此外,1434家企业获得了投资援助,这有助于维持和进一步创造28万个工作岗位。在危机开始时,政府,包括中央银行的资源,将危机应对措施的框架金额定为匈牙利疫情开始和2021年春季经济下滑开始时国内生产总值的18-22%。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已凸显出,有必要研究一个国家在受到流行病袭击时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状况,因为这对危机的进程和管理至关重要。可见,匈牙利近10年的经济指标一直很好(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下降、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公共债务下降等),所以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时,国家处于稳定的经济状况,在疫情的初期,主要是采取并逐渐扩大局部限制措施。对旅游业、餐饮业、活动组织业、酒店和运输服务的需求因应对疫情的举措而大幅减少。

2021年秋天,已出现了大规模确诊病例,所以疫情防控措施也更加严格了。在这时候采取的限制性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也产生了严重影响(Árva-Várhelyi, 2020)。这些措施导致了经济表现的大幅下降。“需求的降低引发了累积的经济下降趋势。限制性措施导致产量和服务的减少、经营单位关闭、供应困难和全球价值链的损害。除了直接经济影响外,限制性措施的心理因素也很重要(Pozsgay et al., 2021)。

在疫情发生的第一年已可看到,大多数家庭的储备金都减少了。许多家庭都有贷款,主要是房贷或个贷。因此,与匈牙利央行协调施行的暂缓偿还贷款计划对低收入家庭的财务平衡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危机期间,财政政策作为经济治理的基本工具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因为它集中和再分配在经济中产生的收入。这包括社会经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融资、家庭补偿收入的分配和对企业的经济支持。而央行通过其缓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来调节收入的购买力。

根据豪尔毛伊·彼得（Halmai, 2019）的研究，我们将欧盟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规则分为两大类。第一是，平衡预算的规则（禁止融资赤字，所谓的黄金规则，经常性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业务收入和支出的平衡，结构性平衡，调整后的平衡）第二是，赤字规则（总体赤字或结构性赤字额度的限制）。然而，在危机爆发后，欧盟已（口头上）放开了3%的马斯特里赫特预算赤字限制，这意味着公共开支和补贴可以从预算赤字中增加，当然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无疑是税收。在危机期间，如果减少税收和捐税（根据凯恩斯的模式）就会创造一种额外的需求，从而减少供应过剩（Lentner, 2013）。在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利用财政政策来减税，使更多的收入留在家庭和企业，从而帮助振兴经济。在对危机管理的任何评估中，应该同时考虑到增长和平衡的后果。这些后果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就业率、经济增长、财政平衡和国债变化上。

凯恩斯的目标是改善社会机制，平息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并且认为，因此国家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使其公民，特别是失业者的生活尽可能地轻松。凯恩斯的理论如今仍然有效。总的来说，注意到以前和现在的全球危机可以得出结论，以下公共财政论点被得到证实：较好的财政和平衡状况导致较好的危机过程和较少的产出损失和收缩（Magas, 2019）。

自疫情爆发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目的是直接或间接帮助企业。还出现一种向微型和小型企业提供1000万欧元的无息贷款，以帮助振兴经济的贷款计划。这个计划规定，借款人可以在三年内免于还款。这符合本届政府的总体经济政策，即利用贷款而不是收入替代或补充福利的方式来缓解经济困难，因此可以将它用来取代企业家的其他，没有免于暂停偿付的信贷。这种贷款可能鼓励企业着眼于更长远的发展。

其他此类支持措施包括为企业家创造就业机会的太阳能电池板计划、空调计划和房屋装修贷款计划。政府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因疫情危机严陷入困难的企业维持运行，藉此保护员工。在就业保护行动计划范围内，延长了优惠政策，以帮助企业和家庭尽可能地度过危机。

信贷有关的措施的目的是稳定民众的经济状况。自疫情爆发以来，考虑到保持经济活力的需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民众。2020年3月18日未偿还债务的所有个人和企业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支付义务被暂停，并且规定，在暂停期结束后应该继续偿债。银行可以在暂停期间对债务收取利息，从而需要偿还的总金额可能增加，但从2021年开始，每月的还款额不能改变。暂停支付的时间被延长。也就是说，到2021年9月30日为止不需要还债。在暂停期间积累的应付利息，须在暂停期结束后，连同剩余期限的分期付款，在还款期内以每年等额的方式支付。此外还规定，从2021年10月开始（在暂停后），每月的还款额不能增加，但还款期将延长。暂停偿债适用于住房贷款、抵押贷款、个人贷款、汽车贷款、快速贷款、货物贷款、信用卡债务、透支、学生贷款以及信贷和租赁信贷合同。暂停偿债是自动批准的，但是债务人可以要求根据合同继续还款。政府直到2021年

底将把从2020年3月19日开始的消费贷款的年化利率限制在5.9%（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最高年化利率不适用于抵押贷款。

根据政府关于税收的可能最主要的决定，在旅游、酒店、娱乐、体育、文化和客运等产业领域的雇主被免除所有缴纳捐税的义务，而员工则被免除缴纳养老金捐税，而且医疗保险费也降低至法定最低水平。在规定的时期，根据“小纳税人逐项一次性税”（KATA）纳税的出租车司机可免除统一费率的缴纳义务，而且有关纳税人也不需要缴纳旅游业发展捐税。在旅游、餐饮、娱乐、体育、文化和客运等领域，房屋租赁合同不得解除，租金不得提高。另一个优惠是扩大了自助餐式的福利（员工膳食和休闲津贴）范围内的项目，其中提高了免税/优惠的门槛。

政府在2020年11月设立了产业工资补贴项目，以帮助受疫情严重打击的产业的员工获得工资。自这个项目开始以来，1.6万多雇主提交了为大约11.5万名员工工资有关的资助申请。所申请的资助金额超过410亿福林。所申请的资助的95%得到了审批，这意味着有关企业将获得共390亿福林。在酒店餐饮业，产业工资援助总额的比率也相似，到2021年春天为止，支付了220亿福林的工资补贴。

在财政措施范围内，对家庭提供的进一步财政支持包括增加育儿津贴的金额，从而帮助成千上万的家庭，因为家庭有更多的钱。

为了降低失业率，简化了失业者登记程序。求职者可以在线登记，以避免排队，并且简化手续。所需要的文件应该上传，但其前提是失业者具备适当的相应设备来上传拍照/扫描的文件。

财政状况、推论和建议

与13年前的危机管理相比，财政政策应在这场疫情危机的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本文重点讨论财政危机管理工具。另一个将对财政和货币路径的修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危机引发了危机后更强烈的市场定位，这使得公司和国民经济的效率问题更加凸显。“自然界的挑战为包括货币论分析师、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管理者在内的所有人敲响警钟，在危机之后我们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形势的变化，并相应地调整我们人为规则、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实践。”（Botos, 2020）。换句话说，经济、人民（主要消费者）和社会各阶层的目标是尽快达到一个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点，即使不完全是在我们停止的那个地方，但也要谨慎地接近它，并且恢复“循环”。还需要考虑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不仅造成了经济损失，又创造在危机后的“重建”中，人类沿着绿色指导方针，走向更有韧性低碳经济的机会。注意到环境的可持续性，在2021年关于匈牙利中央银行的法律中引入了可持续性任务。

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封闭和经济衰退凸显了传统“线性经济”的局限性（如过度的环境污染）和全球化供应链的脆弱性。但空前规模的政府和欧盟干预也提供了为实施更现代的，能应对环境挑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

环境退化和污染）的经济政策，也为提高重视环保问题的循环经济创造了机会（Banks – Gravis, 2021）。循环经济是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具有韧性的经济，同时创造新商业机会和超越狭隘经济利益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就如毛托尔奇·哲尔吉（Matolcsy, 1998）表述，“知识和信息是现代经济的动力”。有竞争力的国家的基础在于小规模行政机构和高效、透明的机构体系，而匈牙利在这一领域严重落后。毛托尔奇·哲尔吉在2020年夏天写道：“近十年，匈牙利经济在2010年的财政转折和2013年的货币政策转折的基础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功。央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有助于使匈牙利经济走上可持续的趋同道路，同时也加强了经济的免疫力。这也是匈牙利为应对近几个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危机有了充分准备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处理短期后果的同时，也必须有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未来十年的赢家将是那些能够迅速适应冠状病毒疫情后新世界新规范的国家。21世纪的规范正在形成，每个国家都有机会站在现有的和新冠疫情危机中出现的新大趋势的最前沿。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匈牙利的增长模式：保持我国的优势，至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以创新方式利用我们的储备，并成为新大趋势中的赢家。”（Matolcsy, 2020/b）

但问题是，匈牙利能否以及如何能有效地重组其经济，然后能否以及如何加入新竞争趋势。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货币政策发挥新作用的世界里，这些是否可行？

在前十年末，已有一些问题出现。与过去的经济表现相比，匈牙利主要在广泛的基础上¹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国际上，以及与中欧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匈牙利在趋同方面已落后（Csaba, 2018）。参见表1、。

表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占欧盟28国的百分比

国家	2010年	2019年	改善（赶上的程度）
爱沙尼亚	65.3	83.3	18%
拉脱维亚	52.9	68.6	15.7%
立陶宛	60.3	83.0	22.7%
匈牙利	65.1	72.7	7.6%
波兰	62.4	72.4	10%
罗马尼亚	50.9	69.2	18.3%
斯洛伐克	69.7	75	5.3%

来源：2020年欧统局（欧元数据占GDP的百分比）

根据匈牙利的局势,由于国家的特点,持久赶上欧洲的下一个阶段是发展通常为国内的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和出口市场渗透率,为此目的(本来自上个十年中期以来理应)改善知识和健康产业的服务质量,从而技能更高的,更健康的劳动力能通过持续生产优质产品来获得市场份额,尤其是在中小企业部门。虽然匈牙利教育和医疗保健系统在目前(平庸)的水平上能满足跨国公司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但目的是确保中小型企业也能充分获得训练有素和健康的劳动力。中小企业雇佣市场员工的75%,而仅占GDP的40%(这本身就表明效率较低),再说,国民经济投资当中只享受25-40%(欧盟自主和国家的其他资源)。这显示竞争力落后的局势。中小企业过度依赖补贴,但为了审批补贴也没有特别要求克服主要是公司规模小而造成的效率方面的瓶颈。在通过财政和商会利益代表方式促进横向兼并方面没有实质性进展,以及使个人所得税成为单位数税率、进一步降低公司所得税(例如对符合环保标准的公司)等也都没有实现。不过控制税收政策的变化很可能导致家庭和企业储备的增加,这可能使这两个部门能以更强的财务状况面对危机,从而在2020年春天可以减少对国家资助的需求。

由于新冠疫情危机的影响,在财政空间中出现了赤字,而且国债也随之增加。在2010年和2019年之间,债务对GDP的比重下降了15%,但是在一年之内,这种下降趋势基本上得到了扭转并且国债中的外汇比率²也在向负的方向发展。2021年的预算法中赤字目标已被修订为7.5%,而2020年的GDP产出预计也呈现5.1%的下降。2022年的预算法预计赤字为5.9%,债务率在很有利的汇率条件下(来自于职权的乐观)预计为79.3%。

针对预算赤字的支出扩大,从我国东方伙伴处借入约40000亿福林的投资信贷前景³,以及欧盟7年预算周期中关于2021年的15000亿福林净资助(相当于GDP的2.7%),以及计划从欧洲重建基金中提取的25000亿福林的现代化和重建援助,都表明匈牙利经济将有大量的投资,但提取这些资金的可能性暂时很小。⁴近年来的和2022年初的工资增长、家庭退税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国家、企业和民众方面产生了大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这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并随之导致通胀飙升,但有效需求也可能导致进口增加,因此对外经济和国际收支逆差上升。减少提取和使用(相当于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0000亿福林的)投资基金,也可以考虑为一种另类的危机管理方案,这可能有助于缓解经济的通胀压力和财政平衡的恶化。有鉴于此,政府决定只要求欧盟复苏计划的资助部分,而潜在的贷款部分(Stiglitz, 2003)⁵(相当于34000亿福林)只有在资助不支付的情况下才会要求使用,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举措。因此,匈牙利经济同时面临在经济中投入过多的(投资)资金和预算赤字(缺乏资源)以及其融资问题。

通过消除被认为是疫情危机“热点”的传染可以复兴经济,但在重组同时,应努力降低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和国债,同时提高经济部门目前稍微落后的国际竞争力。

备注

- ¹ 例如，引进大规模劳动力参与生产，制定严格的控制制度，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政府和中央银行对中小企业部门的充分支持。
- ² 到2020年11月份，匈牙利从市场借了25亿欧元的外币贷款，而且贷款的规模此后一直持续上升。在2010年代，在以福林为单位的内部融资领域取得的进展一直在逐渐下降。
- ³ 在这方面最重要和最必要的是向俄罗斯借约3万亿福林的款项，但由于俄乌冲突，提取这笔资金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
- ⁴ 近年来，匈牙利的投资表现在欧盟中名列前茅，投资率为28%。2020年，国家投资率为6.5%。
- ⁵ 匈牙利政府拒绝借贷背后的理由可能是基于以前的经验，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作为贷款条件曾提出一些所谓的政治要求，从而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关于这种机制的危害性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STIGLITZ, Jozef, 2003）。另一方面，欧盟通过频繁提及法治标准并没有为其贷款的使用表现出支持性态度。
- ⁶ 到2020年11月份，匈牙利从市场借了25亿欧元的外币贷款，而且贷款的规模此后一直持续上升。在2010年代，在以福林为单位的内部融资领域取得的进展一直在逐渐下降。
- ⁷ 在这方面最重要和最必要的是向俄罗斯借约3万亿福林的款项，但由于俄乌冲突，提取这笔资金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
- ⁸ 近年来，匈牙利的投资表现在欧盟中名列前茅，投资率为28%。2020年，国家投资率为6.5%。
- ⁹ 匈牙利政府拒绝借贷背后的理由可能是基于以前的经验，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作为贷款条件曾提出一些所谓的政治要求，从而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关于这种机制的危害性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STIGLITZ, Jozef, 2003）。另一方面，欧盟通过频繁提及法治标准并没有为其贷款的使用表现出支持性态度。

参考文献

- Árva, L. – Várhelyi, T. (2020): Elmozdulás a minőségi turizmus felé. A fenntarthatóság a turizmusban a koronavírus járvány után. 《向优质旅游迈进。新冠病毒疫情后旅游业的可持续性》 *Polgári Szemle*, 16. évf. 1-3. sz.
- Banks, I. – Gravis, L. (2021) (eds.): *The Circular Economy: A Transformative Covid-19 Recovery Strategy How Policymakers can Pave the Way to a Low carbon*, 《循环经济：变革性的新冠病毒复苏战略。政策制定者如何为低碳、繁荣的未来铺平道路》 Prosperous Future,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 Botos, K. (2020): A koronavírus válság és a világ régiói. 《新冠病毒危机与世界各地》 *Polgári Szemle*, 16. évf. 4–6. szám, pp 51-66
- Borio, C. – Disyatat, P. (2021):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Privileged Powers, Entwined Responsibilities. 《货币和财政政策：特权权力，相互交织的责任》 *Suerf Policy Note*, Issue No 238, May 2021, p. 12.
- Czeczeli, V. – Kolozsi, P. P. – Kutasi, G. – Marton, Á. (2020): Gazdasági kitettség és válságállóság exogén sokk esetén: A Covid-19 járvány rövid távú gazdasági hatásai az EU-ban. 《经济风险和对外来冲击的抵御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对欧盟的短期经济影响》 *Pénzügyi Szemle*, 65. évf. 3. sz. pp323.349
- Csaba, L. (2018): *Válság Gazdaság Világ Adalék Közép-Európa három évtizedes gazdaságtörténetéhez (1988-2018)*. 《危机、经济、世界——中欧三十年经济史的附加信息（1988-2018年）》 Éghajlat Kiadó.

- Domokos, L. (2016/a): Az Állami Számvevőszék jogosítványainak kiteljesedése az új közpénzügyi szabályozás tükrében. 《在新公共财政法规范范围内审计署权利的完善》 *Pénzügyi Szemle*, 2016/3. pp 299-319
- Domokos, L. – Várpalotai, V. – Jakovác, K. – Németh, E. – Makkai, M. – Horváth, M. (2016/b): Szempontok az állammenedzsment megújításához. Fókuszban az állami és önkormányzati tulajdonú gazdasági társaságok irányítása. 《更新公共管理的注意事项。重点关注国有和市属企业的管理问题》 *Pénzügyi Szemle*, 61. évf. 2. sz. pp 185-204
- Domokos, L. (2019): *Ellenőrzés – a fenntartható jó kormányzás eszköze*. 《检查—可持续善治工具》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 Halmi, P. (2019): *Tagállami integrációs modellek. A gazdasági kormányzás új dimenziói az Európai Unióban*. 《欧盟成员国的一体化模式。欧盟经济治理的新层面》 Dialóg Campus. pp 144-146
- Kornai, J. (2006): The Great Transition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 Success and Disappointment. 《中东欧的大转型：成功与失望。转型期的经济》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4. No. 2. pp. 207-244
- Kovács, Á. (2016): Költségvetési Tanács a magyar Alaptörvényben. 《匈牙利基本法关于预算理事会的规定》 *Pénzügyi Szemle*, 2016/3. pp 320-337
- Kovács, R. (2021): Az önkormányzatok az államrendszerben: Múlt, jelen és jövő. 《国家体系中的地方政府：过去、现在和未来》 *Új Magyar Közigazgatás*, 14: 3. pp 9-17
- Lentner, Cs. (2013): *Közpénzügyek és államháztartástan*. 《公共财政和政府财政》 Nemzeti Közszerkesztési és Tankönyvkiadó. p.169
- Lentner, Cs. (2015) (szerk.): *A devizahitelezés nagy kézikönyve*. 《外币借贷的大指南》 Nemzeti Közszerkesztési és Tankönyvkiadó.
- Lentner, Cs. (2016): *Rendszerváltás és pénzügypolitika. Tények és tévhitek*. 《政治制度转变和金融政策。事实与谬见》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 Lentner, Cs. (2019): *Önkormányzati pénz és vagyongazdálkodás*. 《地方政府资金和财产管理》 Dialóg Campus Kiadó.
- Magas, I. (2019): Tíz évvel a világgazdasági válság után. 《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十年》 *Pénzügyi Szemle*, 2019/1. pp 94-110
- Matolcsy, Gy. (1998): *Sokk vagy kevés?* 《冲击多还是少?》 Kairosz Kiadó, Budapest. p49
- Matolcsy, Gy. (2020/a): *Egyensúly és növekedés 2010-2019 – Sereghajtóból újra éllovas*. 《平衡与增长, 2010-2019年 - 从名列榜尾又称为先锋》 Második, újra átdolgozott kiadás. Magyar Nemzeti Bank. p 702
- Matolcsy, Gy. (2020/b): Quo vadis Hungaria? – Arcra egy új világ felé. 《匈牙利你走向哪里 — 面向一个新世界》 *Polgári Szemle*, 16. évf. 1-3. sz. pp 13-35
- Posgay, I. – Regős, G. – Horváth, D. – Molnár, D. (2020): A koronavírus-járvány gazdasági hatásairól, 《论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Polgári Szemle*, 16. évf. 4-6. szám. pp 31-50 DOI: 10.24307/psz.2020.1004 (下载日期: 2021年07月05日)
- Stumpf, I. (2014): *Erős állam - alkotmányos korlátok*. 《强大的国家 - 宪法的约束》 Századvég Kiadó. pp 18-24
- Stiglitz, J. (2003): Globalization and Discontents. 《全球化和不满情绪》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46/j.0391-5026.2003.00107.x> (下载日期: 2021年07月14日)
- Virág, B. (2020) Szerk.: *Tízszáz év számokban (Trianon 100) – Magyarország elmúlt 100 évének gazdaságtörténete*. 《十乘十年的数据 - 匈牙利近一百年的经济史》 Magyar Nemzeti Bank.

法规汇编

《匈牙利基本法》（2011年4月25日）第36条第4款至第6款
2011年有关匈牙利审计署的第六十六号法律
2011年有关匈牙利经济稳定的第一百九十四号法律
2013年有关匈牙利中央银行的第一百三十九号法律